

# 惠斯陶勒盖碑文与回鹘的崛起

敖特根 马 静 黄恬恬

(西北民族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 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的北方草原上, 突厥和回鹘先后建立政权。得益于丰富的汉文史料, 有关突厥、回鹘崛起之后的历史研究成果颇丰, 相对而言回鹘早期崛起的历史探讨略显不足。惠斯陶勒盖石碑的发现, 为回鹘势力崛起于漠北蒙古高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具体的细节材料, 具有重要的补史价值。残存的碑文内容对研究早期回鹘的崛起历史、西突厥史、甚至蒙古语言文字的历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故本文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深入探讨惠斯陶勒盖碑中所反映的回鹘早期崛起的历史, 即西突厥泥利可汗被回鹘酋长菩萨可汗所杀的史实, 从而将回鹘早期发展的历史向前推进 20 年, 填补我们对回鹘在铁勒部落中兴起历史的认识空缺。

**关键词:** 惠斯陶勒盖 西突厥 铁勒 回鹘 泥利可汗 菩萨可汗

**中图分类号:** K9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3-0117-12

## 一、惠斯陶勒盖石碑的发现和相关研究

1975 年蒙古国考古学家纳·达瓦安 (N. Davaan) 从图拉河左岸, 更具体地说在蒙古国布尔干省一个名叫惠斯陶勒盖的小山坡北段一处中间凹陷的圆形石堆里发现了只是在单面有文字的两块石碑, 今存于蒙古国科学院历史和考古研究所。学者们根据其出土地点一般称之为“惠斯陶勒盖碑文”(以下简称 HT 碑文)。过去虽在一两篇文章里刊布了碑文图片, 并对其外观、尺寸等进行了介绍, 但是对碑文文字进行科学的、系统的解读还只是近几年的事。2014 年 8 月, 获得土耳其有关部门的赞助, 估计出于此碑很可能与古突厥有关的一种猜测, 来自土耳其、德国和法国的 4 位专家赴蒙古国对惠斯陶勒盖碑文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解读, 并确认其为用婆罗米文镌刻的 [准] 蒙古语碑, 年代

**收稿日期:** 2019-04-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俄藏蒙古文文献目录译介与研究”(18ZDA323); 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文献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敖特根 (1965- ), 男, 蒙古族, 内蒙赤峰市人。教授, 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敦煌学及蒙元史研究。马静 (1995- ), 女, 甘肃甘谷人。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蒙元史研究。黄恬恬 (1994- ), 女, 陕西三原人。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蒙元史研究。

大约为 5-7 世纪,也就是说属于柔然帝国或突厥汗国早期历史阶段。随后,该考察团成员利用近三年时间对碑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围绕碑文文字、语言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等问题相继撰写四篇论文,并提交于 2017 年在匈牙利塞克什白堡举行的第 60 届国际阿尔泰学常会“来自蒙古草原最早的碑铭”分会进行讨论,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热议。该碑文的发现不仅有可能将蒙古语言文字历史往前推 600 年,而且对回鹘等发迹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早期历史提供了全新的史料,其意义重大。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惠斯陶勒盖碑文内容,试对回鹘的早期历史作进一步探讨。

### (一) HT 碑文的内容

石碑的文字选用的是婆罗米文,这很引人注目。婆罗米文(Brahmi)是印度最古老的文字系统,是现代印度式文字如天城文、泰米尔文、孟加拉文、藏文的来源。婆罗米文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元五至十世纪流行于塔里木盆地,在那里它取代了早期的佉卢文,所以婆罗米文的选用可能有特殊的用意,以下是碑文内容的拉丁文转写:

#### 1. biti[g]-nar qaγan digin šine-n bodi-satva törö-k

书/写出的东西-复 可汗 特勤(王子)新-属格 菩萨 出生-未来式动名词

#### 2. qaγan buda qaγan-u uqa-qu uqa-ju kera Añaqay

可汗 佛 可汗-属格 理解/领会-未来式动名词 理解/领会-不完全副动词 国家(图木舒克语)阿那瓌

#### 3. [?.]-i te-n ja-qu bod-i beg-ey-nar bayy-i-ø dolu ja-ju (h)ügbü +?

[头衔]-宾格 说-副动词(引述动词)指/告-未来式动名词 部落-宾格 伯克/官员-? -复 有/存在-祈使语气 七 指/告-不完全副动词 ??

#### 4. b[i]ñ[g] jilo-nar q[a]ra-n[V]ya-γun tuwa purö-r čiçi-rä pügüg nele-n

书/写出的东西(碑文?)石-复 看-? -名词化标记 都波/都播(部落名)? -名词化标记 刺-目的副动词 ? 合-情态副动词

#### 5. [+] q[a]γa[n-u?] qato-nar düge-d niri qaγan türük qaγan

可汗-属格 合敦(皇后)-复 弟弟-复 泥利可汗 突厥可汗

#### 6. uç d[ö]rö taya-ju kera erkin bar-γo[] paxir [+]xaci h[igbi]-j

? 政权/国家 祭奠-不完全副动词 国家 俟斤(酋首)? /百姓? 抓/握-名词化标记? /巴里坤?? ? ?

#### 7. tüg-ju uqa-ba-r-nar qaγan qan-i jula-ba tün-ü tüg-n[V]yā tuwa

尽勾/足够-不完全副动词 理解/领会-过去时-名词化标记-复 可汗 年号-宾格 闪耀-过去时 那-属格 尽勾/足够-? 都波/都播(部落名)

#### 8. [ir]ge[n] tu[] to[γo]-γun pütig-či šini-n bodi-satva törö-k qaγan

百姓? 数-名词化标记? -动作执行者 新-属格 菩萨 出生-未来式动名词 可汗

#### 9. [+][l][+] [i]-yU uç bitig-in [++][g]\*-+ tuwa par qaγan törö-k qaγan-un

?? ? 书/写出的东西-属格 ? ? 都波/都播(部落名) 人 可汗 出生-未来式动名词

可汗-属格

10. pada-Niri qayan tügüg [qa]ya[n] [k/g]ji-n ubi-ǰ jalo-ba-ǰ darqa-d ǰay bi

被根除-? 泥利 可汗 突厥 可汗 靠近/追随-情态副动词 ? -过去时 拨正/弄直-过去时-过去时 达尔罕-复 命运 有

11. [e]ün bitig [+säg pag [+<sup>2</sup>+<sup>3</sup>]] [+<sup>2</sup>+<sup>3</sup>] darqa-n b[i]ti-be qa

这 书 ???? 达尔罕 写-过去时 ?

部分内容的尝试性译文:<sup>①</sup>

1-3. 碑文的可汗 [和] 特勤。<sup>②</sup> 将出生 (再生) 为新菩萨的可汗, 领会佛可汗所领会的, 把指称 [本] 国阿那瓌 (?) [头衔] 的部落, 伯克们 (官员们) ... 七次指 [给?] ... 4. 看 [着?] 石刻铭文, 都波/都播 (?) [百姓?] ... 为了刺伤 ... 联合 ... 5. ... 可汗的合敦 (皇后) 们 [和] 弟弟们, [和] 泥利可汗突厥可汗 6. ... 祭奠国家, [以及] 国家的俟斤 (酋首) (?) [和] 收税员 (?) / 巴里坤 (?) ... 7. 尽够着, 领会者们照亮了可汗的执政年代。都波/都播 (?) 8. 百姓 ... 计数 ... 将会以新菩萨出生 [再生] 的可汗 9-10. ... 书/碑文的 ... 都波/都播 (?) 百姓 (?) [从] 将出生 [再生] 为可汗的可汗被分离 (?) ... [他们] 跟随泥利可汗突厥可汗 ... [他] 指挥 [他们]。达尔罕们有福了 11. 此书/碑文由 ... 达尔罕写的。

(二) HT 碑文的相关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 来自土耳其、德国和法国的 4 位专家撰写了四篇研究 HT 碑文的系列论文, 并提交于 2017 年在匈牙利塞克什白堡举行的第 60 届国际阿尔泰学常会“来自蒙古草原最早的碑铭”分会进行讨论。这四篇论文分别是迈赫迈特·欧勒麦兹 (Mehmet Ölmez) 《惠斯陶勒盖碑文: 关于石碑的发现、保存地点、保存状况以及我们的考察队》; 迪特·毛厄 (Dieter Maue) 《惠斯陶勒盖碑文—符号和语音》; 亚历山大·沃文 (Alexander Vovin) 《对惠斯陶勒盖碑文的注解》以及魏义天 (É. de la Vaissière) 《惠斯陶勒盖碑文的历史背景》。他们主要是围绕石碑发现位置、碑文文字、语言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论述。

首先, 迈赫迈特·欧勒麦兹简要介绍了 HT 石碑的发现、研究状况和相关信息。他在文章中提到: HT 碑是由蒙古国考古学家纳·达瓦安 (N. Davaan) 于 1975 年发现的; 之后, 一些学者撰文刊布碑铭图片或介绍其所在地、形状和大小等内容; 过去人们没有科学、系统地解读碑文, 只是判断它有可能来自匈奴。作者在结尾写到: “对于突厥语和蒙古语历史来说, 这显然是一个开创性的碑文, 在释读 HT 碑文 (二) 的情况下, 才

① Alexander Vov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resented at the panel “Earliest inscriptions from the Mongolian steppe”, 60th PIAC, Székesfehérvár, Hungary, August 31, 2017.

② 这是第一块石碑所记录的。

能更好地理解 HT 碑文（一）”。<sup>①</sup>

系统释读 HT 碑文的学者是迪特·毛厄。他的论文由总论、符号统计、语音统计、附录四部分组成。“总论”对惠斯陶勒盖碑文的语言、文字及其特征进行了概述：惠斯陶勒盖碑文是用婆罗米文由上而下、从右向左，以音节为单位书写的；词与词之间画一水平线相分隔。关于碑文语言，他在文章中写到：“我们关注的很可能是一种 [准] 蒙古语”。

他认为该发现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1) HT 碑文文字毫无疑问具有世俗内容，而布谷特 (Bugut) 碑婆罗米文部分也应该如此；(2) 同一种婆罗米文变体在第一突厥汗国领土上普遍被使用；(3) (a) 在布谷特双语合璧碑铭中的主要内容是用婆罗米文而非粟特文镌刻的；(b) 在克伦根塔斯 (Keregentas) 铭文中除了婆罗米文外尚存巴克托利亚文——这些事实表明，婆罗米文曾被用于记录帝国或官方语言，而巴克托利亚和粟特语及其文字分别在第一突厥汗国西部和东部地区才具有“共用文字”和“共用语言”的地位。在充分分析惠斯陶勒盖碑文语言元音和辅音系统的基础上，作者指出：“总而言之，HT 碑文中的元音和辅音系统在大体上（只能是大体上）同 [原始] 蒙古语和准蒙古语中的元音和辅音系统一致。”

对碑铭文字而言，作者认为：“至今，有人认为相应的回鹘文婆罗米符号是回鹘人离开蒙古草原（公元 840 年），西迁至高昌之后，受婆罗米文吐火罗和图木舒克变体的影响下创造出来的。然而，与布谷特-克伦根塔斯符号之间的惊人的相似性告诉我们，回鹘文的  $k\bar{a}$  和  $g_1a$  其实是沿袭了之前的符号。换句话说，草原婆罗米文在吐鲁番绿洲周围的回鹘寺院中再度出现之前一定在某个地方生存了几个世纪之久”；“我们认为 HT 碑文的年代要晚于布谷特碑（约公元 582 年）”；“不过为 HT 碑文准确定年，尚需其他证据”。<sup>②</sup>

而亚历山大·沃文在迪特·毛厄解读工作的基础上，将 HT 碑文（一）中的 11 行文字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翻译和注疏。通过对碑文文字的语素分析，作者指出：“惠斯陶勒盖碑文具有某种蒙古语形式，尽管可以有条件地称之为准蒙古语，但它更接近蒙古语主流，如中古蒙古语和现存诸现代蒙古语，而不是鲜卑-契丹语。”在文章的结论中，他进一步重申：“我相信，我们报告中最具创新性和革命性的语言学部分是：[我们认为] 在草原上因连续文本的存在而得以证明了的第一个‘阿尔泰’类语言不是古突厥语，而是蒙古语。事实上，它现在不仅把蒙古语置于一种 6 世纪末或 7 世纪初的具有文献证据的语言，而且使其成为具有属于公元 594 或 596 年的第一个连续文本

① Mehmet Ölmez, “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On the discovery, the whereabouts, condition of the stones, and our expedition,” presented at the panel “Earliest inscriptions from the Mongolian steppe”, 60th PIAC, Székesfehérvár, Hungary, August 31, 2017.

② Dieter Maue, “The 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 signs and sounds,” presented at the panel “Earliest inscriptions from the Mongolian steppe”, 60th PIAC, Székesfehérvár, Hungary, August 31, 2017.

的朝鲜语在‘阿尔泰’类语言中的有力竞争者”；“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发现也可能潜在地逆转了把借用的方向总是由突厥语指向蒙古语的传统观点，因为它们中的一些借词将会拥有更加确定的蒙古语来源”。<sup>①</sup> 由此看来，惠斯陶勒盖碑文的发现就有可能将蒙古语言文字的历史往前推六百年。

以上学者重点解读了有关碑文的文字及语言特点等，法国历史学家魏义天则通过解读碑文内容探究了碑文起源，即关于碑文的历史背景。作者认为 HT 碑属于 5-7 世纪，即柔然或突厥初期。他认为婆罗米文的选用引人注目，它明显偏离了突厥人的碑铭文字。关于碑文语言，最为重要的是它接近蒙古语主流。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在公元 5 至 7 世纪，操蒙古语的群体应该在蒙古东部和满洲里一带，但是在这里有一位统治者在蒙古中-西部地区使用蒙古语，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作者认为这应该是帝国的语言，而非部落自身的语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有可能的就是柔然，因为柔然语是这一时期蒙古草原上的最主要的非突厥帝国语言，而且柔然上层笃信佛教，这也能够与婆罗米文的选用相吻合。另外，碑文中几处提到了菩萨可汗和突厥的泥利可汗（595-604 在位）。这些信息对确定碑文内容和年代具有决定性意义。作者基于碑文出土地点、语言文字的选用等外部数据，并通过对碑文内容，尤其对碑文中出现的官衔、专有名词以及一些独立的词语等内部数据进行认真的分析与研究，认为碑文主要叙述了回鹘菩萨可汗的生平，他可能在 20 年前击败泥利可汗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西突厥泥利可汗势力的重创，标志着回鹘势力的崛起。也就是说惠斯陶勒盖碑文标志着回鹘在铁勒部落北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开始。<sup>②</sup>

## 二、学界对回鹘早期历史的探究

目前，学界对回鹘早期历史的探究，主要以汉文史料为主。众所周知，汉文文献存在着一定的史料局限性，它是以中原地区为历史记述中心和出发点，与其他民族之间存在着语言、地域、民族上的一些差异和障碍，相互之间联系不太紧密，所以认知上的不充分就导致汉文史料对历史时期各游牧民族政权的相关史实记载过于笼统，细节内容不够充分。通过梳理回鹘早期历史的相关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文献记载体现出对回鹘兴盛时期和后期同中原王朝往来的历史情况记述较为翔实，而对回鹘兴盛之前，即早期崛起的历史过程记载较为简略的特点，除此以外，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回鹘早期崛起和兴盛的历史过程记述遗漏或是偏差等问题。所以，受限于史料的单一性和汉文记载的简略性，对于回鹘早期历史的相关研究，学界大多也都侧重于回鹘强盛时期。

<sup>①</sup> Alexander Vov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resented at the panel "Earliest inscriptions from the Mongolian steppe", 60th PIAC, Székesfehérvár, Hungary, August 31, 2017.

<sup>②</sup>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o the Hüis Tolgoi Inscription," presented at the panel "Earliest inscriptions from the Mongolian steppe", 60th PIAC, Székesfehérvár, Hungary, August 31, 2017.



有关于回鹘早期历史的相关史料,《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汉文史书记载内容较多。这些文献集中反映了有关回鹘名称的演变、族源考证、部众从属、兴盛过程、以及早期与隋唐之间交流往来的历史内容,学界大多就此类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论述。

首先,关于回鹘名称的演变,学界观点基本一致。回鹘,是中国古代活跃于漠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部落,是今天维吾尔族与裕固族的共同祖先。<sup>①</sup>该部落名称首见于《旧唐书》,在历史时期回鹘的写法及称谓都不相同。起先名为“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回纥首领合·骨咄禄·毗伽可汗为表诚意,向唐朝上表并请求改部落名“回纥”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这才改称为“回鹘”。“回纥”在隋朝时期作“韦纥”,“韦纥”在南北朝时期又作“袁纥”。《新唐书·回鹘传上》载:“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sup>②</sup>

回鹘最初是漠北游牧民族部落联盟铁勒部下的一支,后来随着部族势力的不断发展才逐渐组成了以其势力为主的回纥部,并在后期发展成为游牧民族政权。所以,“韦纥”、“袁纥”等是部落联盟内的部族名称,而“回鹘/回纥”乃是部落联盟的一种政权性质的称呼,后期才成为一个民族。正如申友良先生所言:“‘回纥’一词为维吾尔这一名称的古译。回纥兴于隋,强盛于唐,到唐代成为民族的名称与汗国的名称。”<sup>③</sup>由此看来,回鹘名称的演变体现出了回鹘早期势力发展的变化过程,从“韦纥”发展到“回鹘”,是回鹘部族势力扩大化的体现。

其次,回鹘部族与漠北诸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族源问题是学界探讨的热点与难点,而该问题是由铁勒族属问题的争论引申而来。虽然文献载籍大多反映出回鹘的族源当属汉代的匈奴,有“回纥,其先匈奴也”、“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的记载,但由于受到铁勒部族问题争议的影响,回鹘族源以及与漠北诸族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较为复杂。《旧唐书·回纥传》载:

回纥,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其众微小,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属突厥,近谓之特勒。<sup>④</sup>

由“近谓之特勒”可知,“特勒”乃是唐朝时期对“铁勒”的别称。而铁勒,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铁勒国,匈奴冒顿之后,在突厥国北。”<sup>⑤</sup>故而,后史有“铁勒之先,为匈奴之苗裔”的记述。接着在南北朝时期,铁勒又与高车、丁零之间又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因此,铁勒的族源问题又出现了不同的解释,《魏书·高车传》载:

① 杨富学《回鹘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②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11页。

③ 申友良《中国北方民族及其政权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④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5页。

⑤ [汉]司马迁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915页。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sup>①</sup>

唐初李延寿编著的《北史·高车传》对上述内容做了删改，载：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sup>②</sup>

唐代杜佑在编撰《通典》“高车条”时也承袭了此说法。由此，铁勒与丁零、高车之间的族属关系问题，就成为20世纪以来西域民族史研究领域探讨的一个热点话题。从名称上来看，隋唐时期的铁勒与敕勒为同一部族，汉魏时期的丁零是北方部族内的自称，高车是中原地区对丁零的称呼。<sup>③</sup>从族源关系上来看，铁勒（敕勒）不能等同于丁零，二者族别、族源均不相同。<sup>④</sup>段连勤的《丁零、高车与铁勒》专著是对漠北诸族关系问题深入探讨的重大成果，他从氏族部落组成和分布、社会经济及风俗等各方面，对三者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证和论述。<sup>⑤</sup>胡玉春则在《再论丁零与敕勒、高车之族源关系》一文中提出了新的观点，表明：“根据对丁零民族的迁徙活动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关系特点的考察，敕勒族应是丁零与匈奴融合后产生的新族体，高车是敕勒族的他族。”<sup>⑥</sup>总之，铁勒、敕勒、高车、丁零等部族皆不可一概而论，而关于铁勒族源问题的探讨仍在继续。

相对而言，比较明确的是随着铁勒的不断发展壮大，其部族种类逐渐增多，部众和姓氏也变得较为混杂。铁勒部“种类最多”，独洛河北面就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sup>⑦</sup>。武德初（618—620），又有“薛延陀、契苾、回纥、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部、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霁等”<sup>⑧</sup>。后来，回鹘从铁勒部崛起，继承了部分部族，《旧唐书·回纥传》载：“特勒始有仆骨、同罗、回纥、拔野古、覆罗，并号俟斤，后称回纥焉。”<sup>⑨</sup>可见，铁勒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游牧政权的影响其部众时增时减，但仍然保持着向前发展的态势，这为早期回鹘部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最后，对于早期回鹘崛起的历史研究，学界大多侧重于贞观年间（627—649），即

① [北齐] 魏收撰《魏书》卷103《高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07页。

② [唐] 李延寿撰《北史》卷98《高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70页。

③ 周建奇提出：“敕勒和高车，它们分别为北方非汉民族和汉族对丁零的称呼，铁勒为敕勒的‘讹’译。”见《鬼方、丁零、敕勒（铁勒）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31—41页。

④ 陈世良断言：“丁零与敕勒族源不同，笼统地讲：一为北狄，一为西戎。”见《敕勒非丁零考辨》，《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79页。

⑤ 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 胡玉春《再论丁零与敕勒、高车之族源关系》，《阴山学刊》2015年第2期，第23页。

⑦ [唐] 魏徵撰《隋书》卷84《北狄传·铁勒》，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79页。

⑧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铁勒》，第5343页。

⑨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195页。

贞观初年回鹘部大振至强盛时期。比如杨富学先生的《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sup>①</sup>、申友良先生的《中国北方民族及其政权研究》等研究专著，就细致地阐明了回鹘强盛的整个过程。在汉文史书当中，《旧唐书》则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早期回鹘兴盛的历史，载：

贞观初，菩萨与薛延陀侵突厥北边，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十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鬣山，因逐北至于天山，又进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回纥由是大振。因率其众附于薛延陀，号菩萨为“活颉利发”，仍遣使朝贡。<sup>②</sup>

结合史料和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菩萨与薛延陀共同侵犯突厥北边，攻打突厥颉利可汗并取得大获全胜的这一历史性的胜利直接促成了回鹘部的振兴，是回鹘兴起的关键性时刻。那么，在此之前的回鹘势力又是一个怎样的发展形态呢？对此鲜有学者关注并进行讨论。翔实的史料记载加之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让人难免产生回鹘是在唐朝贞观初年才兴起的误解，而且对于回鹘势力发展的早期似乎仍旧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从铁勒部众当中崛起，成为新的部落联盟主力的发展过程不明确。不过，幸得“惠斯陶勒盖”石碑的发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史料依据，这才得以填补我们对回鹘早期崛起历史的认识。

### 三、HT 碑文中所反映的回鹘早期崛起历史

从目前能够翻译出来的 HT 碑文的部分内容来看，该碑主要记述的是回鹘（回纥）酋长菩萨的伟大功绩以及后辈对他的赞颂之辞。我们从碑文的第 4-6 行内容可以了解到：西突厥泥利可汗、他的合敦（皇后）们和弟弟们，有可能是被菩萨联合都波/都播民众杀死的，并将他祭献给了国家、酋首俟斤<sup>③</sup>、收税员之类的最高统治者。法国学者魏义天也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谈到碑文有可能是铁勒人为记载西突厥泥利可汗被铁勒部落首领菩萨可汗所杀之事。这段史实在汉文史料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找到泥利可汗被铁勒打败的其他记述，如《隋书》载：“是岁（仁寿元年，601），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步迦寻亦大乱，奚、霫五部内徙，步迦奔吐谷浑。启民遂有其众，遂遣朝贡。”<sup>④</sup> 文献中并没有具体到泥利可汗究竟是被铁勒部落联盟中的哪位首领打败，而 HT 碑文提到了有可能最终是被回鹘首领菩萨可汗杀死，他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结合汉文史料记载中菩萨可汗的事迹以及分析碑文中出现的泥利、菩萨、都播、突厥等词，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碑文称颂的功绩应该是菩萨率领回纥和铁勒其他部众一同杀死西突厥泥利可汗的历史事件。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那么 HT 石碑的发现

①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195-5196页。

③ “俟斤”为突厥官号爵阶中的一种，一般只授给异姓突厥中实力较弱的部酋，而“俟利发”（或称“颉利发”）则授予强部酋长。

④ [唐]魏徵撰《隋书》卷84《北狄传·突厥》，第1874页。



及其碑文的解读对于回鹘早期势力的崛起和发展的历史研究来讲意义重大。

首先，关于西突厥泥利可汗的生平，《隋书》中记载到：“大逻便为处罗侯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勤之子，是为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橛处罗可汗。”<sup>①</sup>“大逻便”即阿波可汗，木杆可汗之子。“处罗侯”即莫何可汗，沙钵略可汗阿史那摄图之弟，又名叶护可汗。从史料记载内容来看，泥利可汗继位时间应该是在“大逻便为处罗侯所执”之后。据考证，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隋开皇七年（587）<sup>②</sup>，也就是说泥利可汗继位于587年之后。且史书记载其妻向氏嫁于泥利可汗的弟弟婆实特勤，并在开皇末年一同入隋朝，期间达头可汗发生叛乱，于是驻留京师，“每舍其鸿胪寺”。<sup>③</sup>由此说明泥利可汗去世时间应当不会晚于开皇末年，即600年之前。但史书记载泥利可汗在隋仁寿年间仍然参与了达头可汗的军事活动，而且《新唐书》载：“达头之奔，泥利亦败，及死，其子达漫立，是为泥橛处罗可汗，政苛察多忌。”<sup>④</sup>可见，达头奔走到吐谷浑之后，泥利可汗仍然在位，这就将泥利可汗去世的时间延续到了601年之后，与上述的史料记载相互冲突。对此，我们还可以从泥利之子达漫的即位时间，推测出泥利可汗统治的结束时间，《隋书·铁勒传》中记载：

大业元年（605），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sup>⑤</sup>

处罗可汗为西突厥汗国泥利可汗之子，名为达漫，继位后称“泥橛处罗可汗”。从上述汉文史料记载判断，时大业元年西突厥泥利可汗之子已即可汗位，说明其父泥利可汗是在605年之前去世的。法国学者魏义天在《东罗马皇帝莫里斯和突厥可汗：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所记突厥史料》一文同样指出：根据1953年，在新疆伊犁昭苏县附近发现的一座突厥样式的石人像，以及分析在石像下身的一段铭文可知，泥利可汗是在595年自立为汗，且自称是最高可汗，控制天山北部。根据十二生肖体系的事件断代，他得出泥利可汗去世的时间应该是599年或者是604年。接着由“铭文指出这座雕像是在泥利可汗的陵园为纪念泥利可汗而建”，最终确定了泥利可汗去世真正的时间为604年。<sup>⑥</sup>另外，据《北史》记载，在开皇九年（589）隋文帝平陈前后，大义公主<sup>⑦</sup>想

① [唐] 魏徵撰《隋书》卷84《北狄传·西突厥》，第1876页

② 林幹《突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③ [唐] 李延寿撰《北史》卷99《突厥传》，第3300页。

④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下》，第6056页。

⑤ [唐] 魏徵撰《隋书》卷84《北狄传·铁勒》，第1880页。

⑥ [法] 魏义天，赵飞宇、马翊斐译《东罗马皇帝莫里斯和突厥可汗：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卡塔所记突厥史料》，《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第91-147页。

⑦ 大义公主，原名宇文芳，是北周赵王宇文招之女。大象元年（579），突厥强盛，佗（他）钵可汗向北周提出和亲请求，宣帝宇文赧为了国家的安定，同意了佗钵的请求，便选择宗室之女宇文芳为和亲公主，封号“千金公主”，妻于都蓝可汗，之后由隋文帝改封“大义公主”。

借突厥势力反抗隋文帝的统治，与西突厥的泥利可汗相联结。<sup>①</sup>这说明泥利可汗的继位时间不会晚于589年，大致应在587-589之间。而魏义天提到的595年，应该是指泥利被立为西突厥大可汗的时间，那么588年左右应该就是泥利继任部落酋长的时间，严格意义上来讲，笔者认为泥利可汗的继任可汗的时间要从588年左右算起，而他以大可汗的身份开始真正统治西突厥的时间大约是在595-604年之间。由此可以看出，菩萨杀死的泥利可汗绝对不是突厥内部的一位小可汗，它是继达头可汗之后的西突厥第二代可汗，是突厥政权内部极具影响力的统治者，其历史意义可见一斑。

其次，碑文第1-3行提到的阿那瓌，是南北朝时期，柔然衰落之时的一位可汗。他继任汗位的时间是在公元520年至公元552年，<sup>②</sup>说明碑文的前三行应该记述的是阿那瓌在位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首先，阿那瓌在公元552年是被突厥战败并自杀的，这是柔然帝国彻底崩溃，以及突厥势力由此崛起和振兴的历史标志。那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碑文前三行记载了回鹘敢于反叛突厥的原因，也就是说回鹘部落有可能是因突厥成功反叛柔然之后，从此势力大振，并逐渐发展强盛，借此来鼓舞士气或是喻示官员和部众奋起反抗突厥统治，这说明HT碑的建立是有意将菩萨可汗的功绩与反抗柔然政权成功崛起的早期突厥统治者相类比。如果这种猜测成立的话，那么说明此时的回鹘，在备受突厥势力镇压的背景下已有了开始积攒力量准备崛起的意识。但也许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即再述柔然覆灭史实，或许是有意借此作为出兵突厥的理由，合理化此次作战的性质。因为铁勒部在6世纪初是受柔然帝国管辖，长期接受柔然文化的影响，碑文的语言选择有可能是柔然语，说明当时柔然帝国的文化仍然在曾经统属下的部族内部继续延续，这种现象直接体现出了早期突厥政权在政治管理上的分散，但更加体现出菩萨为了明确出兵突厥的理由，是有意借用了柔然政权为突厥所灭的这一历史缘故，这也就是碑文中为什么会出现记述柔然政权最后一位统治者的原因所在。论述至此我们发现，研究回鹘早期崛起历史的关键是回鹘部酋长菩萨可汗。

突厥在六世纪上半叶中，臣于柔然，柔然亦称蠕蠕。<sup>③</sup>552年突厥打败柔然，建立起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势力迅速扩展至整个蒙古高原，铁勒诸部受强大的突厥政权辖制和奴役。《清史稿·地理志二十三·新疆·迪化府》载：“隋大业中，西突厥始大，铁勒诸部皆臣之。唐贞观时内属。”<sup>④</sup>虽然铁勒中的众多部族臣属于西突厥，但其势力却并不弱小。《新五代史·唐本纪》就有载：“当是时，西突厥有铁勒、延陀、阿史那之类为最大。”<sup>⑤</sup>这就导致后期势力较强的各部众迫于突厥对铁勒大肆的掠夺和压制，经常联合部众奋起反抗突厥统治。

① [唐]李延寿撰《北史》卷99《突厥传·铁勒》，第3296页。

② 田建平《论阿那瓌》，《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70页。

③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5页。

④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76《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373页。

⑤ [宋]欧阳修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4《唐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页。

在隋朝大业元年之前，即西突厥泥利可汗被杀之前，当时铁勒与突厥之间的关系在汉文史籍中是这样描述的：“其俗骁强，依托高车，臣服突厥……自突厥有国，东征西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sup>①</sup>说明铁勒诸部长期臣属于突厥，是突厥所属的众多小国之一。铁勒虽对突厥是臣属关系，但始终与突厥之间存在矛盾，恰好在此时铁勒部落对试图征服他们的泥利可汗进行了一场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在泥利可汗被杀之后，铁勒与突厥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铁勒反叛屡见史册。《隋书》中记载：“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sup>②</sup>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因为猜忌薛延陀等部，害怕发生叛乱，于是“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处罗可汗的抚御无道导致铁勒和薛延陀等部“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sup>③</sup>此间契苾部、薛延陀部首领被推立为可汗和小可汗，在这其中，尚有铁勒部落中的韦纥、仆固、同罗、拔野古和覆罗等部落参与。<sup>④</sup>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其实早在大业元年初期，铁勒部落的势力已经不容小觑，尤其是在菩萨杀死西突厥的泥利可汗这一决定性的战争之后，这标志着归属于突厥系的回鹘人当时正在兴起。所以，关于早期回鹘的发展历史研究，我们可以把汉文史料当中记载的关于回鹘崛起的年限向前推进20年，即605年左右。而这一时期对于菩萨来讲，正是他带领韦纥（回纥）部在铁勒部落联盟中发展壮大的初期。

最后，菩萨可汗在击败泥利可汗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角色，但他的在位时间汉文史籍中无明确记载，我们不知道他的统治是始于何时。从汉文史书记载来看，他在620年仍然处于活跃状态，但在贞观二十年（646）之时，回纥部落可汗已经由胡禄·俟利发·吐迷度担任，由此可知，菩萨可汗的在位时间最晚至646年之前。再者，假如这个石碑真的是菩萨所立，或者是他身边的人所立，那么这个石碑被发现的地区应该是铁勒部落的中心。石碑的建立应该是在泥利可汗死亡之后，或是菩萨可汗死亡之后，如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它的建立时间应该是在604年又或者是646年左右。

到了隋唐之际，回纥统一了铁勒诸部，还杀败和驱逐了突厥，势力逐渐在西突厥所统辖下的各部族之间强盛起来。到开元年间中期，回鹘渐盛，由原来的九姓部落，逐渐发展成为十一部落。自菩萨父特健俟斤开始，至吐迷度自称可汗，此期间回鹘从铁勒部落中脱颖而出，成为大漠南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如史书所载：“回纥之盛，由菩萨之兴焉。”<sup>⑤</sup>所以这段时期是回鹘势力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作为特健俟斤和吐迷度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菩萨，则在早期回鹘势力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总之，HT碑文所记载的西突厥泥利可汗被铁勒部落的菩萨可汗所杀，这一历史事

①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195页。

② 泥掘处罗可汗

③ [唐]魏徵撰《隋书》卷84《北狄传·铁勒》，第1880页。

④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第3页。

⑤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196页。

件足以证明回鹘在铁勒诸族当中的势力。菩萨能率领其他铁勒部族反抗突厥统治并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一定程度上说明回鹘虽然无法完全摆脱突厥的束缚，但其势力已然开始崛起。此碑虽然是对菩萨伟大事迹的记述，多是歌功颂德之辞，但它又是以谁的名义为菩萨而设立，以及它的建立过程又是怎样的，这还有待我们去深入探究。

#### 四、结论

在研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史的过程中，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我们对少数民族文献利用较少，因而汉文史籍便成为了研究少数民族史的重要文献。但是因为汉文史料更多专注于记载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的部分民族史事，而且由于各种转写、音译的不准确导致对其当时的历史事件记载上存在自相矛盾的特点，因此汉文史料的不足表现的极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考古资料对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就立刻凸显了出来，成为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史料依据。

通过结合史料和碑文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泥利可汗的在位时间基本可以确定在 595-604 年之间。
2. 最终，泥利可汗为铁勒部落的首长菩萨率领其他部众所杀，这标志着早期回鹘势力的崛起。由此，关于回鹘发展历史的研究可以再向前推进 20 年，即回鹘势力的崛起时间应该在 605 年左右。
3. 菩萨可汗的在位时间最晚至 646 年之前。
4. 惠斯陶勒盖碑文的发现就有可能将蒙古语言文字的历史往前推六百年。
5. 惠斯陶勒盖石碑的建立时间应该在 604 年或 646 年左右，且石碑被发现的地区应该是铁勒部落的中心。

所以 HT 石碑的发现及其对碑文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汉文史料记载的不足，为填补西突厥史料的空缺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关于西突厥泥利可汗的史实记载开始渐趋清晰、具体和完整化。同时，此碑的建立标志着回鹘势力在铁勒部落占据主导地位的开始，这为研究早期回鹘势力的形成及发展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而石碑的发现和碑文的解读，对于研究早期回鹘的崛起历史、西突厥史、甚至蒙古语言文字的历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